

# 西双版纳傣族“超域”的互联网社交研究

徐何珊<sup>1</sup>

**【摘要】**：社交媒体改变了人与人的连接方式，但并不意味着其使人们的社交方式变得同一，行为主体会根据所处的场域和惯习“驯化”社交媒体，体现出族群的差异性。西双版纳多个傣族村寨的案例表明，从社交范围和特点来看，傣族人在使用社交媒体进行对外交往的过程中，结合了地方社会文化特质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当地人基于网络“脱域”的连接，在既有人际关系的基础上向外拓展，形成“超域”的社会交往，反映出信息时代傣族人在面对传统与现代时的文化调适。

**【关键词】**：社会交往 傣族 社交媒体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20）06—0110—07

## 一、线上社会交往问题的提出

互联网与新媒体以互动性、聚合性、超时空性、去中心化等特征，显著地改变了人与人的连接方式。人们的日常生活浸润于各类新兴的社交媒体中，并凭借这些新兴社交媒体形成了新的线上社会交往方式。继而线上社交与社会关系的探讨，成为互联网人类学的重要议题。

以威尔曼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的对外交往会形成以个人为中心的“个体网络”（Personal Network）人际关系方式。这种交往是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地缘连接显得不那么重要。<sup>①</sup>由此，一些学者提出这种个体交往将使社会变得原子化。借助虚拟的网络所形成的“群”重构了社会，使传统的本地团体开始碎片化。<sup>②</sup>也有相反观点认为，即使数码传播途径具有突破地域限制的变革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超越已有的社会连接，而是通过“共在”（co-present）超越距离，使远程的亲密情感连接得以维系。<sup>③</sup>其有助于社区凝聚和建立社群感。此外，有学者归纳线上交往的四种类型：第一类是用来维护既存的社会关系网络，其成员在虚拟社区中的身份和现实身份具有高度一致性；第二类是现实生活中社区的延续，这类线上社会交往建立在具有共同地域环境基础之上，是仅当成员们建立起线下互动关系后才形成的现实身份交往；第三类是基于共同兴趣爱好的弱连接关系；第四类是在动态的线上社会网络中的互动。<sup>④</sup>但该作者并未对这四种类型进行实证分析。英国人类学教授米勒曾发起对9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线上社交考察，认为全世界的媒体社交情况并非一致，例如：在瑞士，社交媒体的扩散并不一定产生新的社会关系的扩展，一个小群高度集约化的亲密关系已经足够他们所需的社会连通性与多种沟通渠道；而在意大利，社交媒体主要是作为线下社交生活的补充或者修复，一般而言，只有当他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或不满时，社交媒体才可能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途径。<sup>⑤</sup>其提出了线上社交的族群差异性。

基于民族学视角的研究和分析，笔者赞同米勒的观点，不同文化背景和地区对互联网及社交媒体的态度、使用行为等差异，使各群体体现出线上社交的不同特点，其中的关键在于行为主体。网络媒体提供了新的社会生活方式，但人并非被动地受制于网络媒体。媒体的本质是信息传递的载体，在社会和文化发展过程中扮演中介角色。媒体的中介化理论认为，媒体（Media）对人类交往和意义建构起到中介的作用，它既能作为力量之一参与社会改造，也可被人们所塑造。<sup>⑥</sup>媒体具有被“驯化”（Domesticizing）的性质。西尔弗斯在研究电视与社会时，提出电视被“驯化”的四个阶段——Appropriation，

<sup>1</sup>作者简介：徐何珊，女，傣族，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社会文化人类学、媒介人类学研究。

基金项目：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创新团队项目“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重大问题研究”；云南省社会科学院2020年院级项目“自媒体时代云南跨境民族网络安全问题研究”（项目号：SKYYJ202021）的阶段性成果

---

Objectification, Incorporation, and Conversion。<sup>③</sup> 社交媒体同样要经过人的一系列“驯化”，通过选择性采纳、改造等过程将其纳入日常生活中并赋予其意义。

笔者于 2017 至 2019 年对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多个傣族村寨如曼列村、曼召村、曼峦勒村等进行了长期的田野调查发现，傣族村民基于地方社会文化场域和惯习，“驯化”网络社交媒体，其线上社交并没有完全脱离于传统现实中的社会关系网络，他们将既有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并接入社交媒体之中，进行线上线下相互勾连的社交活动<sup>④</sup>。与此同时，村民们也在利用网络“脱域”（disembedding）的连接特点，在另外的时空中实现结合。<sup>⑤</sup>

## 二、傣族传统的对外人际交往

傣族村民传统人际交往范围多局限于村寨及周边的熟人圈子，村寨外的社会交往不多。且与外界交往时，一般多以村寨集体和组织作为依托开展群体性的社会交往，较少以个体的形式进行对外交往，其原因在于：

首先，在前新媒体时代，西双版纳的傣族村民以稻米生产和割胶为主业，生产生活较为同质化，且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大多能自给自足，由此决定了其情感和物质交换的社交圈主要集中在村寨及向外辐射的周边地区，靠近村寨的地区连接较为密切，越往外脱离村民的主要活动范围和社会网络则连接越弱。

其次傣族村寨有着丰富的社会组织，村民们习惯结伴而行，以群组为单位进行多对多的对外交往。如傣族有着以村寨为单位的交往节日“撒咋”，每 3 至 5 年，举行一次兄弟寨交往，届时一寨村民到兄弟村寨进行集体交往活动，下一次又轮到他们来做客，依次轮流。各个村寨还有老年协会、僧侣团体也会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村寨间甚至国际交流活动。最常见的就是俗称“打老庚”的年龄组交往，傣语称之为“郭秀”<sup>⑥</sup>，即本村的“郭秀”群体与外村“郭秀”群体的交往活动，这是个体扩大社交圈的主要方式之一，传统傣族村民择偶多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除此之外，还有形式特色各异的舞蹈、傣武术、斗鸡等团体。得益于傣族村寨的社会组织网络，傣族搭建起了村寨内部与外部社会文化连接的桥梁和中介。

在傣乡经常看到，人们初次见面时彼此会问：“你是哪个乡的？”答曰：“橄榄坝某乡的。”“哪个寨子的？”回答：“某某寨子的。”然后问：“你几岁？”以便将对方归为一定的辈分和年龄组，界定彼此的地缘、血缘，从而判断交往的亲疏关系和交往规则。如果年岁差不多且性情相投，那就可以打老庚、认“郭秀”了。总之，要将个体划归在一定地域、村寨、年龄组等群体组织之中，以此确定个体之间的关系，并以差序格局的形式表现出来。由此，“关系主义”作为一种规范与价值，引导着人们的行为取向，成为一种被普遍认可的固定化社会行为模式，并被人们内化为行动的准则。村民生活在村寨及周边关系集结而成的场域中，形成相应的惯习，二者互相作用并在双向生成过程构成了社会交往的真实逻辑，形塑着场域或惯习中的行为。个体就在场域与惯习所确立的各种关系的前提和背景之下做出特定的行为反应，表现出连续的、针对一定对象、适合一定情境要求的行为活动。<sup>①</sup>而随着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传统的傣族村寨对外交往方式也逐渐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 三、社交媒体实践中“超域”的社会交往

威尔曼等人认为在线上社交形成“网络化个人主义”，其影响力会蔓延到现实生活中，人们从“社会人”转化为“网络人”。此外，线上交往的逻辑是“脱域”的，人们以自我为中心可以与地球任意一端的人建立关系，由此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不受传统的地域所限制。

笔者研究发现，傣族的线上交往情况不同于上述理论的预测，在接纳和“驯化”社交媒体的实践中，一方面村民们将既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逻辑与社交媒体连接功能结合了起来，村里基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依旧存在，只不过从现实生活中延续到了网络中，差序格局的关系和群体性交往的逻辑在网络中同样适用。另一方面，村民们利用网络连接的逻辑和特点，在线上将现实关系拓展开来，进行“超域”的对外交流，以扩大人际交往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拓展是在村寨及周边的既有社



---

跨村落的微信群交流还延伸到生产活动各个方面。西双版纳农业局种植科和西双版纳农科院除了提供种植指导，也组织村民建立各地的种植微信群，此外，还有其他部门组建的养殖微信群、橡胶微信群等。这些群的成员不仅跨越了村寨及周边，扩大到乡镇、州市甚至更远的地区，还跨越了民族，包括四川、广西等地的许多汉族种植能手也在群里。

宗教信仰方面也有许多跨村寨的微信群。例如曼召佛爷除了有村寨群和僧侣群，还有如“勐混微帮生活百事通”（499人）、“傣商协会”（350人）、“傣族诵经团”（500人）等微信社交群，群友不仅有出家人，还有想学经的男女信众。这些群让佛爷的交往范围大大超越了过去。

这些新的线上人际连接关系，打开了过去相对封闭的村寨，傣族人的活动范围从既有人际关系网不断向外拓展，以业缘、趣缘、事缘或共同价值观结成了一些新的群体，贯穿于村民日常生活的多个方面。

## （二）跨国界的交往

傣族在境外多称为泰族，是东南亚地区人口较多、分布较广的族群之一。缅甸、泰国、老挝、越南甚至印度的阿萨姆邦均有历史上不同时段从云南迁去的傣族，另外，欧美地区也有傣族社区。他们语言相通，习俗相类，宗教信仰相同，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历史上，边境地区的傣泰族交流交融，关系较为紧密，形成了傣泰文化交流圈。

曼峦勒村村主任说，他们家族的先祖在老挝，自搬到这里后，他是第6代了。他说，当年法国攻打老挝的时候，老挝一名将领率人跑到了中国，至此没有再回去，自己的家乡在老挝勐乌<sup>①</sup>，后来曾有人拿着将领当年的令牌去老挝找勐乌，果真有这个地方，两边拿出的令牌一模一样。当年从老挝来曼峦勒安家的到目前发展为28户。村主任说，以前老人是自己坐车去找亲戚，这几年有了电话和微信联系更多一些，到了橡胶停割的时候就相互走动，老挝亲戚过来小住一星期，或者自己去老挝玩上几天。（访谈时间：2018年1月2日）

西双版纳的傣泐和远在美国的傣族也有联系。美国现有千余户傣族家庭，约5000人，主要分布在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堪萨斯州、伊利诺伊州、亚利桑那州、德克萨斯州、阿肯色州、康涅狄格州、印第安纳州和华盛顿州等地。其中人数较多的为19世纪初从西双版纳勐腊县和勐龙镇搬迁至老挝、泰国，又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美国的傣泐支系。西双版纳文化代表团曾对美国丹佛市的傣族及当地佛寺进行多次访问。勐养曼飞龙寨还有亲戚在美国丹佛，两国傣族共建了微信群，经常发布双方的近况。在“傣族志”“盛太乐”等地方自媒体公众号中，也不时报道美国傣族的情况。

社交媒体还促成了跨国通婚。曼列村就有两位老挝媳妇，最初是傣族村民到境外做生意，在那边建立了社会关系网，结识了现在的妻子，然后通过社交媒体保持密切联系进而得以结合。嫁入中国的妇女们也依靠社交媒体与境外的家人保持着紧密联系。

移居外国的傣族也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商业活动，如曼列寨就有一位微商女老板在泰国定居，但仍用微信与国内的村民保持联系，其上千人的客户群都源自国内的傣族村民。

宗教文化方面的跨境交流则更多了。西双版纳许多村寨的佛爷来自缅甸、老挝等地，即使是当地佛爷，也有机会到泰国、斯里兰卡去留学读书。僧侣之间有着许多东南亚佛教交流群，大部分的佛爷都有自己的电脑和智能手机，装载了多种输入法，包括新傣文、老傣文、缅文、泰文、巴利文等，社交媒体使佛爷们能与国内外信众进行畅通无阻的信息交流。

曼召佛爷来自缅甸，6年前刚来中国的时候，他一句中文不会说，于是通过新媒体自学了中文、泰文，还学会了许多电脑操作技术。他手机中有微信群“TaiTham”（泰、掸族），他可以随时通过社交媒体与家乡亲人朋友联系。平时他喜欢观看泰国的电视剧，线上生活已经成为他的主要社交方式，甚至超过了他在现实中所投入的精力和时间。可以说，他通过社交媒体“穿越”

---

国境，同时“生活”在缅甸和中国，并穿越了现实“生活”在另一个网络世界。（访谈时间：2018年3月29日）

这些跨国界的连接最初是源自人口的流动建立起的社會关系，新兴媒体流行之后，则能依靠信息的流动来不断维系并扩展新的关系，使相隔万里的人们也能获得“共在”感。其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傣族与境外泰族的交流，他们通过便捷的社交媒体做生意、走亲戚、通婚往来，传播宗教文化等，加强了联系，沟通了情感。

通过利用新兴媒体，傣族突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建立起超越村寨熟人圈，甚至超越国境线的连接，社会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连接均是人们有意在既有的社会关系基础之上的拓展和民族文化交流场域的拓宽，而不是完全脱离原有关系场域的“脱域”。可见，人们并非简单地利用和遵循社交媒体的功能，而是有意识地进行“驯化”。

#### 四、表现不突出的傣族“脱域”的跨文化人际交往

对于村民是否常和陌生人建立“脱域”连接的问题，笔者通过调查提供陌生人的社交媒体，如微信、陌陌、探探、微博、快手、抖音、全民K歌及网络游戏等发现，除部分青少年会使用这类新媒体，其他傣族人较少利用这些社交平台进行跨区域的社交，中年人不多，老年人则更少，一般只玩微信。

笔者曾于2018年七八月对曼列村及周边村寨使用手机媒体的村民进行了面对面的问卷调查，发放问卷210份，收回有效问卷206份，有效率为98.09%。问卷通过3个不同角度的问题考察当地人是否尝试脱离既有社会连接，进行一对一的陌生人社交。首先，从直接的问题“是否和陌生人聊天”的回答看，选择只和认识的人聊天的人占比58.74%，偶尔因为好奇等各种因素聊过一两个的人占比35.44%，而选择经常找陌生人聊天的人仅有1.46%。其次，笔者从村民经常使用的微信群中考察他们的社交圈子，其中能够表现为社会关系“脱域”的情况，莫名其妙被拉进群的占12.62%，微商群占12.14%，游戏群占了12.14%，兴趣爱好群占比8.25%，陌生人交友群占比7.91%，外地人的群占比5.83%，与亲戚群占比79.61%、村小组群占比71.84%、同学群占比68.45%相比，显然占比较少。再次，从陌生人交友应用媒体的使用情况看，也可从侧面反映村民是否进行陌生人社交的情况。而调查显示只有11.17%的人使用陌陌、探探查找附近的人，包括具有部分陌生人交友功能的应用微博占比22.33%、快手占比34.47%等，也远远比不上主要活跃于熟人圈子的微信，其使用率达100%。从中可以看出，傣族“脱域”的连接占比非常小，且大多为弱连接。

曼列村的KL(41岁)说：（刚玩微信的时候）我也加过很多的陌生人。他们主动来加我。后来也有很多人把我拉黑的，陌生人我不聊，我的微信朋友只有176人，我看快手直播上说可以加到5000人。“摇一摇”我玩过一次，摇到广东的大学生，很久没有联系了，没有共同话题，她从来没有来过西双版纳。以前人家拉我进去的各种群太多了，我都退了，有些是微商的群，我就不和他们打招呼。有的是被踢出来的，有的是我自己退的，还有的是陌生人把我拉黑的。我聊的人大部分都是傣族。（外面的群）我就留着斗鸡群，有两三个。（访谈时间：2018年3月12日）

KL认为即使他曾有一些陌生人的群，也因缺乏社群感和参与感而最终选择退群。笔者访问了一些玩陌陌、快手的初中生和职高生，他们主要关注的还是“同城”信息。

勐罕镇曼列村的YND(18岁)曾说，她在快手同城上看见一个勐仑镇参加告庄水灯节选美的少女，因为是同龄人就加了她的微信，在微信上还没有聊过天，真人遇见一两次的，见面也不打招呼，对看一眼就走了。一般聊天的还是先见过的，直接通过网上认识的没有，而她朋友有过。（访谈时间：2018年12月9日）

笔者在田野调查的村寨中试着用陌陌、快手等社交媒体查看同城发布的情况，再次验证了大部分是外来的移民和流动的非傣族人群在使用陌生人交友软件，而当地的傣族很少使用这些社交媒体，这与村民描述的情况大致相同。

由此可见，即使社交媒体实现了超越物理空间连接的技术，使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文化之间建立联系成为可能，但人们不一定因此就认识更多的陌生人，并以此来无限拓展自己的社交圈子。傣族村民的社交范围虽然有了极大的拓展，超越了原有的生活领域，但仍然没有脱离于社会文化的关系场域。可见，在当前新媒体时代，村民们的社会交往也没有完全被个体化、脱域的网络交往方式所取代。

## 五、傣族“超域”的社会连接形成的原因

傣族形成“超域”的互联网社会交往方式的主要原因如下：

### （一）由傣族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决定

传统傣族以村寨为社会组织单位，村与村之间界限分明，人们生活在以村寨为中心的一定范围内，个体被整合到了村寨各个群体组织之中，且归属感很强。如今虽然傣族村寨人口的流动性逐渐增强，但总体而言，外出打工的人数相对较少。以曼列村为例，2017年常年外出打工的有194人，只占总人口的20.35%，傣族大部分年轻人完成学业之后就回来继承家中的田地和橡胶产业，村寨的社会结构稳定，各种组织功能齐备。从互惠交换的角度来看，人们更多依托熟人社会所建立的关系网进行换工、互助。从主体情感角度来说，村民们只要生活在村寨中，便要遵循集体的行为规范。傣族谚语说“团体一条心——牢固；团体闹分裂——必亡”，“同心开田，共建村寨”。<sup>①</sup>这不止是一种规矩，更是傣族以村寨集体为取向、注重集体归属感的民族心理的表现。因此，即使是在线上的社会交往也会基本遵循既有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并基于一定的关系“场域”向外拓展。同时，与陌生人的交往还潜藏着不安全因素，这与傣族人习惯于熟人社会的生活违背。

### （二）受差序格局影响

虽然互联网的连接逻辑是去中心化，但在网络社交实践中，傣族人以彼此身份来界定关系亲疏的习惯仍然适用。他们通过地缘、趣缘、共同的价值观及认同等来寻找彼此的连接点。此外，很多傣族村民的朋友圈是分群可见的，他们在不同的微信群有着不同的表现，这表明在他们的意识和行为中，即使是线上的社会关系也有着亲疏远近的差序格局。在线上社交中，人际关系的联结与建立依托于各种不同的纽带，包括地缘、血缘以及共同的趣缘、业缘、利益，并以个人的价值观与认同感作为关系衡量标准，一层层向外推远。越往内的人际关系，如从小在同一环境中长大有着地缘血缘关系、已形成相近价值取向的同村社会组织成员连接最强，越往外则因共同点减少，联系的紧密程度逐步减弱。对于傣族村民来说，陌生人的“脱域”连接则属于最外层极易断开的弱连接。其微信群交往由近及远、由强到弱，如一层层荡开的水波纹的关系差序，其与现实中有着相近的格局，线上线下交往呈现出指示关系。

### （三）受语言文化的“意义空间”制约

网络人际交往也有边界。即使网络传播也遵循“意义空间”的传播规律，即要达到有效的传播，获得意义的交换有一个前提，即交换的双方必须有共通的意义空间，否则就会产生理解上的偏差与误解。共通的意义空间有两层含义：一是对传播中使用的语言、文字等符号含义有着共通的理解；二是有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sup>①</sup>傣族受语言、风俗文化、宗教信仰、民族情感等因素制约，信息传达与思想交流有一定的藩篱，由此形成了“意义空间”。即使社交媒体可以让当地人与远在地球另一边的人连接起来，但如果无法形成共同的意义空间，这种连接也是短暂易断的。

可见，西双版纳傣族村民没有因受网络的连接逻辑影响而完全改变自身社会文化传统，其线上的社交圈和人际关系有着一定的差序格局与意义空间。

## 六、结语

---

进入到信息化时代，傣族人主动拥抱新媒体，在运用社交媒体进行对外社会交往中，形成了“超域”交往，极大地拓展了社会交往圈，而不是局限于现有的社会关系和活动范围之中。超时空连接、单点连接、海量的弱连接等网络连接逻辑带来的是大量陌生的社会关系涌入并撕裂着傣族熟人社会，“流动的现代性”、风险与陌生挑战着傣族以集体为取向的传统民族心理和原有的社会秩序。使得原本相对封闭和边远的、以村寨共同体为独立单位的社会逐渐被打开，与更多的社区、内地主流文化甚至与境外更广阔的世界勾连起来，并建立起更为紧密的多种关系和利益连接，逐渐走向开放多元多层次的复杂社会。与此同时，“超域”的连接方式没有打破傣族社会以地域空间和强关系主导的差序格局，人们没有完全脱离现实社会文化场域，也没有走向个体化的分离。傣族在熟人社会与开放陌生关系的拉扯中，通过“驯化”社交媒体进行调适，由此应对互联网可能会造成的社会分裂，维护村寨社会的稳定。这是傣族在结合自身社会文化特质的基础上，顺应社会网络媒介化发展的一种创新与特色，显示出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信息时代表现的地方性、差异性乃至民族性。

由此，信息时代的社会媒介化转型，不能简单归结于强化社群与社区或导致社会原子化。而今后随着信息的增多与人的流动性逐渐增大，未来人们身处的场域或将发生巨变，人与人之间的知识结构、思想情感或许会越来越趋同，届时人们信息交流的意义空间与交往范围是否能够真的脱离地域和血缘，反差序格局成为“原子化”的社会，或建立起更紧密的社群关系，还需持续的跟进观察与谨慎论证。

新媒体强大的渗透力量和跨时空的传播逻辑，迅速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生活，网络社交新方式的产生使技术决定论的声音不绝于耳。但是新的技术、新的连接方式并不意味着会完全颠覆人们既有的交往方式与社交习惯，更并不意味着将使人们的社交模式变得同一。本文研究与米勒教授的观点相吻合，即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中的人们对于社交媒体的态度和“驯化”实践具有族群性差异。人们会依据日常生活的文化场域和惯习，选择性地采纳、改造网络技术而形成富有主体能动性和地方性特色的线上社会生活。强调文化的相对性，这亦是民族学者研究线上社交的意义所在。其带来的命题是：在信息革命的当下，是我们在利用媒介技术改变世界，还是技术在改变我们？互联网作为全球性与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对于社会的影响仍基于其在地方场景和当地人的实践，其既反映了网络媒体本土化实践的差异性，也体现了未来对于人与互联网的互动碰撞出更多创造力和可能性的期待。

#### 注释：

1 参见 Lee Rainie, Barry Wellman: *Networked: The New Social Operating System*. MIT Press, 2012, P7-21.

2 周大鸣、姬广绪：《从“社会”到“群”：互联网时代人际交往方式变迁研究》，《思想战线》2017年第2期。

3 [英]丹尼尔·米勒，希瑟·霍斯特主编：《数码人类学》，王心远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45页。

4 赵联飞：《现代性与虚拟社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77-78页。

5 Daniel Miller, Elisabetta Costa, Nell Haynes. *ect: How the World Changed Social Media*.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Press 2016. p106-186.

6 潘忠党：《“玩转我的 i Phone，搞掂我的世界！”——探讨新传媒技术应用中的“中介化”和“驯化”》，《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7 Silverstone R. *Television and Everyday Life*. London: Routledge Press, 1994. PP122-131.

8 参看徐何珊：《“微信群”与傣族村寨社会的并接——以西双版纳曼列寨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

9[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4页。

10 傣族人习惯以年龄的划分来进行社会交往和建立社会组织，一般3岁左右的年龄差为一个年龄组。傣族村寨中有各个年龄段的组织，也有村寨外建立的年龄群组关系。西双版纳傣语将年龄组成员称为“郭秀”。年龄组在社会活动和换工劳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1 刘金海：《农民行为研究：“关系-行为”范式的探讨及发展》，《中国农村观察》2018年第5期。

12 康郎，西双版纳傣族对还俗的住持佛爷的称呼。

13 勐乌，今为老挝丰沙里省约乌县，包括勐乌、乌得两勐。19世纪末世纪末法国殖民者占领中南半岛的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又于1895年5月27日与清政府签署了《中法续议界务条约》附章五款，清政府将当时勐乌、乌德、化邦、哈当、贺联、盟勐等地割让给法国。当地民众奋起保土护界，支持乌德土司召宛纳哈联合勐乌土司向法军武装抗争，不幸惨遭镇压，致使许多傣族村民从勐乌、乌德迁到西双版纳勐腊县等地。

14 高立士：《傣族谚语》，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16年，第3页。

15 薛可、余明阳主编：《人际传播学》，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1页。